

制度嵌入性与地方食品系统

——基于Z市三个典型社区支持农业(CSA)的案例研究^①

刘 飞

[摘 要] 针对日益恶化的食品安全现实,部分消费者退出了部分主流食品系统,转而纷纷采用替代性的地方食品系统模式。而在地方食品系统中,社区支持农业(CSA)是其最主要的表现形式。文章对Z市三个典型的社区支持农业模式(即消费者推动型、生产者推动型以及NGO推动型)是如何再嵌入到具体的制度情境中,从而解决食品品质不确定性这一问题进行了论述。同时,对于这三大模式之间的异同也进行了简要的分析。

[关键词] 制度嵌入性; 地方食品系统; 社区支持农业; 案例研究

一、问题的缘起

俗话说,“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食品在中国文化中占有毋庸置疑的中心地位。正如魏安妮所言,“倘若没有认识到食品在中国文化中占据着传统的中心地位,任何有关中国食品的研究都将是疏漏不全的。”^[1]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不但通过食品来进行社会区分、建立社会联系与建构认同,而且最基本的社会事实是食品所提供的营养是满足我们生理需求的最基本条件。没有充足的食物,人类将无法生存下去。因而,为消费者提供健康、卫生与安全的食品是社会由政府应尽的责任和义务。然而,近年来,中国却发生了一系列的食品安全丑闻。食品安全事件频发,以致“吃开始成了一件风险的事情”。^[2-3]食品安全之所以会成为一个社会问题,与现代食品系统的转型是分不开的。^[4-5]

在传统社会中,大部分人居住在乡村,并且依靠土地来谋生。他们既是自己食品的生产者,又是这些食品的消费者,食品生产与消费基本上是在同一空间内进行的。在通常情况下,食品是极其短缺的;只有在食品有富余的情况下,他们才会到市场上去交换其他商品(如食盐、肉类,等等)。在该社会中,只有极少数的人在城市中居住,并且他们一般是在市场上直接与生产者进行交易而获取自己所需的食品。但随着工业化的展开与城市化的推进,越来越多的人到城市中居住,食品系统也经历了一个逐步市场化与工业化的过程。^[6-7]与传统食品系统相比,现代食品系统具有如下特征:(1)现代食品系统是高度专业化和工业化的,食品生产者和生产地具有匿名化的特征。(2)食品是通过市场来进行分配的,食品生产的链条较长。为了预防腐烂,食品添加剂等保鲜技术在食品

[收稿日期] 2011-09-26

[作者简介] 刘 飞,中山大学社会学与社会工作学系博士生,邮编:510275。

- ① 本文的初稿曾在2011年中国社会学年会上宣读。感谢中山大学王宁教授、华东政法大学孙沛东博士的大力支持,感谢UCLA的阎云翔教授欣然与笔者分享其未发表的有关食品安全风险的高质量学术论文。上海大学的张敦福教授、武汉大学的张杨波博士、浙江师范大学的林晓珊博士也对本文的初稿提出过诸多建设性意见,特致谢意。
- ② 从广义上来讲,食品安全既包括食品数量安全(food security),又包括食品质量安全(food safety)。鉴于食品数量安全在中国已经基本解决,本文将重点探讨中国社会中日益严峻的食品质量安全问题。下文中的食品安全若无特殊说明,均指食品质量安全(food safety)。

工业中获得了广泛的应用。(3)科学选种和农药、化肥的广泛使用促成了世界范围内的“绿色革命”,这使得食品在数量上极大的丰富。

与传统食品系统相比,现代食品系统是脱嵌于具体的社会结构情境当中的。所谓脱嵌,是指社会关系从彼此互动的地域性关系中,从通过对不确定的时间的无限穿越而被重构的关联中“脱离出来”。^[8]总起来看,这一脱嵌性的现代食品系统对消费者的影响是“好恶交织”的。一方面,消费者获得了更丰富和廉价的食物,食物的选择性也更加自由与便捷。另一方面,现代食品系统中由于农药、化肥、食品添加剂以及转基因等技术的广泛应用,食品中面临着诸多的风险。^①由于食品是一种典型的信任品;也就是说,即使消费者在消费之后也不能了解该商品的安全状况。^[9]在此情况下,独立运作的市场机制几乎是彻底失灵的,因而需要政府的干预。

但从目前食品事件的频发来看,政府干预也没能达到预期的效果;^②这就使中国食品市场面临着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双重困境。面对食品安全风险所带来的不确定性,必须确定一些社会装置来减少这些不确定性。在这方面,食品的再地方化——地方食品系统(local food system)为消费者提供了一种在主流市场机制之外的一种替代性选择方案。依据美国社区营养学家 Feenstra 的观点,食品系统是指“深深植根于特定的地域,对农民和消费者来说在经济上是可行的,使用生态合理的生产和分配实践。并且,提高社会公正和社区内所有成员的民主的一种模式。”^[10]而其中,社区支持农业是其最主要的表现形式。

社区支持农业这一概念在1971年最先被一群关注食品中化学物质的日本妇女所提出并发展。他们与地方农民签订合同,规划合作关系,触发了“teikei”^③运动。^[11]这一模式随后在瑞士和德国发展起来。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美国的CSA运动开始获得较大的发展。截至2007年,美国的CSA农场数已达到12549个。^[12]

所谓社区支持农业(Community Support Agriculture),是指一种向生产者或操作者支付一份农场中产品年费的行为。生产者在种植之前收到收入;消费者在(农作物)生长季节收到食品。^[13]其中,消费者和生产者共担风险。生产者有一个产品的及时市场,消费者获得新鲜的本地产品(通常是有机产品)。同时,也支持了环境友好的农业实践和土地使用。^[14]CSA的成员不仅知道他们的食品是在哪里(where)、是何时(when)成长的,也知道是谁(who)种植的。在理想的情境下,成员认识农场中的其他成员,形成了一个“饮食者社群”。他们在与农民工作以帮助农场成功方面有共同的兴趣。^[15]CSA概念同时颂扬土地管理、社区、小农以及城乡合作精神。目的是依据一种新的、热心公益的经济合约来再造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本土联系。^[16]

近年来由于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中国食品安全事故频发。为了捍卫自己的健康权益,以中产阶级为代表的社区支持农业运动开始在中国蓬勃开展起来。^[17-18]与脱嵌性的现代主流食品系统不同,社区支持农业的独特性在于其将脱嵌性的(disembeddedness)市场又重新嵌入(reembedded-

① 这些风险主要包括生物性污染、化学性污染和物理性污染。而具体的包括:食源性疾病、农药残留、兽药残留、食品添加剂以及转基因等(参见:周应恒等.现代食品安全与管理.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8;中国工程院医药卫生学部编.中国食品安全——挑战、问题、认识和办法.北京: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2008)。

② 参见:http://news.xinhuanet.com/food/2011-03/06/c_121153372.htm。此外,据媒体报道,为了规避日趋恶化的食品安全风险,部分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选择在自然条件好的郊区租地种菜而形成了专供部门成员消费的特供消费模式。这种国家机关利用手中的公权力退出主流食品市场的做法有可能使他们对于中国日趋恶化的食品安全现状不闻不问,从而使中国的食品安全局面更加复杂化(参见:邓聿文.特供不除,中国食品难有保障.联合早报(新加坡)2011年9月21日;Demick Barbara. In China, What you eat tells who you are. Los Angeles Times, 9/16/2011)。

③ 从字面意义上翻译,“teikei”意味着“合作”或“伙伴关系”。

ness) 到具体的情境结构当中,从而最大限度减少了食品生产过程中的不确定性。^[19-20] 社区支持农业之所以能够成功的运作,在很大程度上源于这一模式的制度嵌入性。正如 Beckert^[21] 所言,“只有将经济行动嵌入具体的情境结构中才能最大限度地减少不确定性。这些减少不确定性的社会装置(social devices)主要有:(1)传统、习惯与惯例;(2)规范与制度;(3)社会网络、组织结构和路径依赖;(4)权力。也就是说,将脱嵌的经济行为重新嵌入社会情境当中去”。具体来讲,社区支持农业模式是一种典型的制度嵌入性模式。而制度嵌入性则是人的选择行为受到所嵌入其中的制度(包括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约束。^[22-23] 互动中的互惠期待限制行动者的选择,因而减少了不确定性,从而最大限度地确保食品品质。

二、研究案例简介^①

研究的材料是笔者于2011年3月—8月通过5个月田野调查所得,所使用的具体方法主要有参与观察法和深度访谈法。参与观察结束后,笔者都于当日晚及时撰写了田野笔记。深度访谈对象共45人,其中既包括社区支持农业的发起者(负责人),又包括广大的消费者和社区支持农业中的生产者。其中,女性29人,男性16人。在这45人当中,年龄以及学历的分布具有广泛性;而经济方面,主要是都市中有房、有车的中产阶级。由于涉及的话题不太敏感,在征得访谈对象同意的前提下,访谈都进行了录音。访谈时间一般维持在45分钟至1小时30分钟之间,部分访谈持续2个小时以上。录音访谈结束后,所有访谈内容都被转换成文本形式,以便于编码分析。此外,笔者还收集了大量有关各方在网上互动的资料(包括QQ群聊天记录、微博记录、相关各方在互联网主页上发布的信息以及该网页下属分论坛所发表的一些留言,等等)。

之所以选择以下三个案例,是因为他们是正在中国蓬勃发展的社区支持农业的典型。与定量研究追求代表性不同,“典型性不是个案‘再现’总体的性质(代表性),而是个案集中体现了某一类别的现象的重要特征。”^[24] 这三个典型的模式分别是:(1)消费者推动型的“租地种菜”模式;(2)生产者推动型“农家乐租地种菜”模式;(3)NGO推动型合作社模式。

(一)A小区“租地种菜联盟”

A小区位于Z市TH区,交通极为便利。这一联盟的发展缘起于杨先生和社区内几个朋友对“种菜黑幕”的了解:

去年的时候我们几个朋友经常去琶洲那边去玩,了解到了种菜的黑幕。比如,那些菜农怎么昨天打了农药今天就卖。类似这样的一种方式。怎么把菜摘完了然后又泡水。还有一些更外在的一些报道,如毒豇豆。我们经常去那边现场摘菜,慢慢的就和菜农熟起来了。我们租地,菜农打理。我们业主当中,愿意的也可以自己去种菜。(2011年5月28日,杨先生访谈)

开始只有5个朋友加入,杨先生和小区的人讲了之后,迅速就有20多个人加入了进来。之后,陆续有100多户小区业主加入进来。

我们就想,如何解决用户的配送问题。如果菜太少,成本太高,那么这种模式就是不可持续的,没办法推广的。我们就想在一个小区里发展会员,配送费用平摊,这样就能降低费用。很多小区的业主想,可以联合起来租地。就延伸出小区业主联合租地的实践。(2011年5月28日,杨先生访谈)

^① 遵照学术惯例,本文的研究地点和研究案例都进行了匿名化处理。

为此,他们还专门建立了“业主租地种菜QQ群”,以方便种菜业主之间的交流。但随着加入的业主越来越多,管理成了一个很大的问题。杨先生和小区内其他懂电子商务的人士利用业余时间建立了一个租地种菜的网站。网站每3天发布一次各业主菜地的图片信息,便于其他业主关注菜地的进展。同时,业主也可以通过网站这一平台向菜农发布一些指令,如施肥、浇水、整地以及摘菜等等。

(二) B村农家乐

该农家乐距Z市的CH区仅8公里,是CH区政府以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繁荣而建立起来的示范基地。2008年CH区委、区政府将B村的土地集中起来,集体流转而建立B村农家乐。其中,108亩生态菜园向消费者认租,菜地被以一分地^①为单位而划分成若干。消费者每年只要交纳1100元/分地(其中,土地费用是600元,有机肥料、种子、代种以及运输等的费用是500元),就可享受该菜地一年的全部收成。

很多消费者之所以租我们的地种菜,一般是他们来我们的农家乐吃了我们的菜之后觉得好吃,然后才租种的。我们这里不像一般的种菜的,拼命提高菜的数量,使菜看起来“靓”。我们用的全部是像鸡粪、猪粪这些有机肥,种出来的菜当然好吃。这些菜吃起来很香,和市场上卖的菜味道是完全不一样的。(2011年5月21日,部门经理夏先生访谈)

消费者既可以自己亲自打理这份菜地,也可以花钱雇村里的村民帮忙打理,还可以在周末有空的时候,消费者带着家人一起来种种地,吃吃农家乐,然后再带点自己菜地里的菜回去吃。送菜方面,既可以是消费者自己来取;也可以以每周为单位,周末的时候B村农家乐会将菜包装好然后给消费者以箱为单位运送过去。

(三) C耕作城乡互助合作社

C耕作城乡互助合作社是ZS大学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和香港某大学为了破解“三农困局”,以推动城乡合作,共创生态文明与可持续生计发展而由专业社工注册的社会企业。该合作社采取的是“前店后村”的运营模式,在Z市的北京路有一家公平贸易店,在云南平寨、四川映秀、广东从化有三个合作点,并且都有专业的社工进行督导。

其愿景主要是,在自然和生态环境良好的乡村,互助社鼓励村民不用农药、化肥,通过传统的农耕方式种植健康生态的农副产品;在日益关注食品健康的城市,通过开展环保、低碳等社区活动,促进城市居民对乡村传统健康生态食品的认识,为城乡居民直接互动搭建平台,一方面城市居民能够吃到放心、安全的绿色生态有机食品,体验到纯朴自然的乡土生活;另一方面农村居民也能够通过种植无农药、无化肥的生态有机农副产品获得合理的报酬,支持农户可持续生产,保护当地良好的生态环境、传统种植方式和乡土文化,从而达到城乡互惠互利。

为此,该合作社还建立起专门的网站,以展示绿色食品、发布食品预订信息,以及发布预先的活动信息等。此外,该合作社还定期到社区中去举办小集市,售卖绿色食品并向消费者宣传有关食品安全方面的知识。

三、研究发现

(一) 消费者推动型“租地种菜联盟”模式

在食品安全风险面前,消费者并不是社会结构下被动的“傀儡”,他们能够充分发挥能动性来

① 1亩地大约等于667平方米=10分地。1分地也就是66.7m²。

挑战主流的食品系统,从而捍卫自己的健康利益。^[25] A 小区的租地种菜便是该小区中的消费者在食品安全焦虑的情况下,自发组织起来到城郊包地种菜的一种消费实践。在此过程中,他们将城郊菜农^①的地以高于原价 5~10 倍的价格转租过来种植无公害蔬菜。同时,他们还以每月 3 000 元雇佣菜农为他们耕地、种菜,加上其他补贴菜农每月可以获得 3 500 元左右的收入。与以前相比,菜农的收入大幅提高。他们再也不用担心菜价的波动,也不害怕极端天气(如台风、干旱等)对菜地的影响。

对于这些菜农来说,由于他们工资固定,就没有了给菜施化肥和打农药的冲动。正如一位菜农 WHS 先生所言:

以前那,我们总是会给菜施很多化肥,给它打很多农药,也不管它是不是剧毒(农药)。也不管消费者吃了好不好。反正,我们就是要让菜的产量高一些,让卖菜的时候菜看起来好看一点。这样(菜)就能卖个好价钱。别的我们就多不管了。(2011 年 8 月 12 日,对菜农武先生访谈)

租地种菜联盟的负责人杨先生也说道:

在我们这里,农药基本没有用。我们这种机制断掉了菜农使用(农药、化肥)的利益链,完全不会出现用农药的情况。为什么?因为所有用农药的费用不在考核他的范围内的。也就是说,他无利可图的,他不会傻到自己掏钱去买农药和化肥的。

但这样菜农也还可能出现偷懒这种类型的机会主义行为。为了最大限度的制约菜农的机会主义行为,租地种菜联盟对菜农设计了新的考核制度。为了有效地监督菜农,种菜联盟建立起菜地管家制度,菜地管家由小区租地种菜联盟中的业主通过轮班的方式产生。他们既负责监督种菜联盟中的业主给菜农通过网络发布指令(如浇水、施肥)等的落实情况,也负责通过网站上的 QQ 平台发布有关信息,接受租地种菜联盟中的所有业主的监督。

为了保证配送蔬菜的新鲜,菜农一般选择在下午 2~3 点钟开始摘菜,4 点 30 分左右菜就准时送到小区。^② 但此时,诸多业主仍在上班,没时间去拿菜。为此,小区开始招募社区老年志愿者。这些老年志愿者来负责分菜以及为那些尚未下班的业主领菜。因此,小区中的业主之间的互动开始多了起来。正如业主曹女士所言:

以前我们这个小区里的人,彼此都是不认识的。虽然大家住得这么近,但彼此之间完全没什么交往。现在不同了,QQ 群里面大家经常交流一些如何做菜,如何确保食用安全等等这些方面的信息。而且,大家还借助这个平台经常讨论小孩的教育、借一些东西,一起出去活动。哎呀,这一来小区里的人又熟悉起来了。(2011 年 7 月 18 日,对业主曹女士访谈)

为了保证获得更多安全的食品,小区中租地种菜联盟的业主们现在正积极探索建立养鸡、养猪联盟、种水稻联盟等方面的事宜。此外,该模式的发起人杨先生等现正在该市的 CH 区自然生态极好的郊区中租种山林地块,以确保社区中更多的居民能够享受到生态良好且品种多样的有机食品。

① 在广州郊区,种菜的菜农一般是外地人,学界将他们称为“代耕农”。所谓代耕农是指放弃了户籍所在地的耕地,到经济相对发达、土地相对肥沃的地区去耕种其他土地的农民(参见:陈海真.代耕农——新农村建设中的“租约农民”——以惠州市博罗县石湾镇铁场村为例.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 增刊;黄晓星、徐盈艳.双重边缘性与个体化策略——关于代耕农的生存故事.开放时代,2010(5))。

② 在夏天由于天气炎热,为保证菜的新鲜,摘菜和送菜的时间可能会因此而延后。

(二)生产者推动型“农家乐租地种菜”模式

B村农家乐是B企业为了吸引更多的顾客,以增加旅游收入而附加开展的“农家乐租地种菜”模式。该模式是将消费者吃农家菜、住农家店、玩农家乐而配套建立起来的一种租地种菜模式。

该模式的消费者可以分两类:一类是独立的个体消费者;另一类是以机关福利的形式集体租种的机关菜地消费者。独立的个体消费者一般是周末或节假日与家人去菜地一起种菜。正如阎女生所言:

我们平时都忙着上班,但现在的工作量都比较轻。周末的时候一家人一起来劳动一下也很有意思的。出出汗那,什么的也挺好。尤其是把小孩一起带过来,让他也知道菜是怎么从耕地、播种、发芽,到成熟的,等等这些方面,让他们长了见识。小孩子玩这个也很开心。……等菜长好了,摘得也很有意思,然后就带一点回去吃。如果没空的话,我们会打电话,让他们给我们送。(2011年6月22日,对阎女士访谈)

机关福利的形式集体租种机关菜地的消费者一般会在节假日的时候以单位的形式一起来该处摘菜,然后在农家乐吃饭、住店,食品成为他们乡村旅游的重要一环。^[26]平时,他们也可以单独开车来到机关租住的菜地里面摘菜,然后回去。张先生说道:

以前去菜市场买的菜都是用水泡过的,买回去之后吃的话,觉得没什么味道。我们这里的菜就完全不一样的。虽然菜可能看起来上面还有一些虫眼,而且比如青瓜长得没有菜场卖的直,弯弯的,但吃起来味道可完全不一样。这里的菜吃起来很香,和我们小时候家里吃的味道一样。(2011年7月20日,对张先生访谈)

对B企业来说,由于已经提前收到了消费者预先支付的租地和管理费用,他们的收益就有了保障。而且,由于菜的产量和长势与他们的收入已不再挂钩,生产者也没有了去施化肥、打农药的冲动。同时,由于B企业的租地种菜是与他们的吃农家饭、住农家店和玩农家乐是联系在一起的,如果生产者出现机会主义行为(如偷菜、偷懒,等等),那样就会连带影响他们的主营业务。而且,消费者也可以通过定期、不定期抽查的方式来监督生产者的行为,从而使他们不敢懈怠。因而,在这种双重条件的约束下,生产者从事机会主义行为的道德风险也是比较大的。

(三)NGO推动型合作社模式

与上述两种模式不同,C耕作城乡互助合作社是一种典型的NGO推动型合作社模式。ZS大学的专业社工帮助村民发掘当地优良的农副产品资源,鼓励他们以小组的方式合作生产。现在,村民们养了土鸡、蜂蜜、番薯等生态农副产品。社工们还帮村民们联系Z市北京路的C耕作互助合作社进行代售,提高了生产生态副产品的积极性。一般来讲,这些食品的价格都是市场上同类食品价格的3~5倍。由于有强大的经济激励,农民有种植这种高品质食品的积极性。不过,农民也可能会为了增加产量而给作物施化肥、打农药,以及以次充好等等这样的机会主义行为。而NGO所建立起来的专业社工督导的模式使农民从事这种机会主义行为的道德风险最大化了。如果农民想继续留在合作社,他们倾向于不从事这些机会主义行为。

此外,NGO也可以通过食品的外观和颜色初步判断该食品是否用过化肥和农药。为了鼓励消费者监督食品品质,该合作社经常定期、不定期地向消费者发放表格,让消费者反馈他们食用食品后的一些意见与建议。近期就发生过一起消费者对紫米掉色的疑问。在微博上,一位消费者写道:“昨天在小农墟买的紫米,一泡水就变成浑浊的黑色,米就变白了。想起前段时间曝光的染色紫米,不敢吃呀,有吃过紫米的同学告诉我究竟怎么回事么?”

针对上述疑问,C耕作合作社在第一时间通过该合作社网站以公开信的形式回应了该消费者的质疑。该公开信对紫米的来源以及如何科学认识紫米(列出具体的证据)做出了详细的回应,打

消了该消费者的疑虑。

消费者除了可以去该合作社在 Z 市北京路的店购买有机食品外,城乡汇每月定期在一个小区举办一次有机小农墟,也为将生产者和消费者联系起来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平台。

现在的食品安全问题这么多,真的是觉得什么(吃的东西)都不安全。今天过来看了一下,觉得很有收获。虽然这里的東西吧还是比较贵的。你比如,这袋腐竹的价钱是 33 元,比普通超市上的的确贵很多。不过,一看产地和制作工艺,以及这些腐竹的外观,我觉得花 30 多元钱还是蛮值的。(2011 年 4 月 22 日,对魏女士访谈)

生产者可以在这个平台上获得有机食品的交换价值,消费者在这个公平交易平台上体验到了诸多的原生态食品,而且还在这里重拾了传统集市的人情味。此外,消费者也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对生态农副产品的生产给予了支持,客观上促进了社会的生态与环保。

四、结论与讨论

针对日益恶化的食品安全现状,部分消费者采取了用脚投票的方式部分退出了主流的食品系统模式,而纷纷采用替代性的食品系统模式。在风险社会^①的大背景下,主流的食品系统模式(现代食品系统)生产的链条很长,并且通常是去地方化的。在此情境下,食品市场经常会发生贝克所说的“有组织的不负责任”^[27]的问题。即食品生产者、加工商、销售商等等为了各自的利益,在食品生产、运输和销售的各环节给食品过量添加有害人体健康的物质从而增加食品安全风险(food safety risk)。^②替代性的地方食品系统则不同,由于减少了中间环节,直接将生产者和消费者联系起来,这就使脱嵌性的食品市场重新嵌入社会的制度之维当中。^[28]

本文以 Z 市三个社区支持农业为案例来探讨社区支持农业是如何嵌入在具体的制度当中,并经由这种嵌入性的社会结构来约制各方的机会主义行为,从而最大限度地保障食品安全以及各方最基本的利益与价值诉求。

上述三大模式之间的共同点是:(1)生产者和消费者处于直接联系之中,网络成为联系生产者和消费者的重要平台。消费者基本知道食品是何时、何地以及由谁生产的,食品出了任何安全问题消费者都是可以追溯的。(2)由于兼顾生产者利益的制度设计,生产者基本没有了给农产品打农药和施化肥的冲动,而且生产者获得了比从事 CSA 之前更多的利得。(3)消费者不仅获得了新鲜、高品质的地方食品,而且他们还获得了新的价值——体验价值(如本真性)。^[29](4)消费者以实际

① 李友梅认为:我们国家虽然还处在现代化的初期阶段,但从风险生产的机制和风险分配状况看,已经不幸地具备了现代风险社会的主要特征。中国社会的确正在进入一个高风险阶段(参见:李友梅.从财富分配到风险分配:中国社会结构重组的一种新路径.社会 2008(6))。贝克、邓正来和沈国麟也认为:正在经历“压缩的现代化”的中国面临着第一现代性和第二现代性“双重强制”的共时性困境,风险社会或许能够提供一种替代性的社会图景(参见:贝克、邓正来、沈国麟.风险社会与中国——与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的对话.社会学研究 2010(5))。

② 与发达西方国家相比,中国社会面临着更加复杂的食品安全局面。阎云翔认为,中国的食品安全问题可以分为三个层次:(1)食品卫生问题;(2)非安全食品问题;(3)有毒食品问题。食品卫生问题是由于知识不足、条件不好、科学手段不具备而导致的食品安全问题,这属于典型的传统风险。非安全食品问题,是指因为现代生产、流通和消费方式导致的实际或潜在的问题,这属于风险社会中的现代风险。有毒食品问题,是人们为了牟取暴利,有意识地往食品里加毒所引发的问题,这类问题是中国社会所独有的。这三类食品风险是相互交织与重叠的,这使得中国的食品安全问题具有空前的复杂性(参见:阎云翔.解决食品安全问题必须回到社会公正的原点.东方早报 2011 年 8 月 17 日)。

行动促进了城乡互动、维护了小农的生存与基本利益,在客观上也对社会生态与环保作出了贡献。在消费主义肆虐的当今中国,他们践行了“道德消费主义”和负责任的“道德食品消费者”的使命。^[30-31]

当然,由于推动社区支持农业的推动主体分别是消费者、生产者和 NGO,这使他们在具体嵌入的制度存在一些差异。如 NGO 推动型合作社模式还在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多了一个中介——NGO。正如 Janssen 所言,“成功的 CSA 倡议通常依赖于宽广的支持网络,不仅仅包括生产者和消费者。”^[32]之所以需要 NGO 的介入,这是由中国的国情决定的。与西方的农民(farmers)普遍都接受过大学教育以及大部分以前都经历过非农职业相比,中国的农民(peasants)学历普遍较低,并且环保和权利意识都较弱。因而,通过 NGO 来唤醒农民的环保和权利意识在中国就显得尤为必要。此外,这三大模式嵌入的具体制度情境也是迥异的。鉴于本文在第三部分已经做了详细的论述,这里就不再赘述了。

[参考文献]

- [1] 魏安妮. 市场的再生: 南京的食品市场. 中国城市的消费革命. 戴慧思, 卢汉龙, 译.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3
- [2] Caplan Pat ed. , *Risk Revisited*. London: Pluto Press ,2000
- [3] Yan Yunxiang. Food Safety and Social Risk in Contemporary China. Unpublished Manuscript ,2011
- [4] 檀学文 杜志雄. 从可持续食品供应链分析视角看“后现代农业”.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0(3)
- [5] 里茨尔. 社会的麦当劳化. 顾建光,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9
- [6] Beardsworth Alan & Keil Teresa , *Sociology on the Menu*.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7
- [7] Fine Ben & Heasman Michael & Wright Judith , *Consumption in The Age of Affluence: The World of Food*.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6
- [8] 吉登斯. 现代性的后果. 田禾, 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0
- [9] Nelson Phillip , Information and Consumer Behavior. *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70 ,78(2)
- [10] Feenstra G W. Local food systems and sustainable communities. *American Journal of Alternative Agriculture* ,1997 ,12(1)
- [11][32] Janssen Brandi. Local Food ,Local Engagement: CSA in Eastern Iowa. *Culture & Agriculture* 2010 ,32(1)
- [12] Press M. & Arnould E. J. Legitimizing community supported agriculture through American pastoralist ideology. *Journal of Consumer Culture* ,2011 ,11
- [13] Durrenberger Paul E. Community Supported Agriculture in Central Pennsylvania. *Culture & Agriculture* 2002 ,24(2)
- [14] Hinrichs Clare C. Embeddedness and local food systems: notes on two types of direct agricultural market.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2000 ,16
- [15] Cone A. Cynthia & Myhre Andrea. CSA: A Sustainable Alternative to Industry Agriculture?. *Human Organization* ,2000 ,59(2)
- [16] Ostrom Ruth Marcia. Community Supported Agriculture as an Agent of Change//C. Clare Hinrichs & Thomas A. Lyson. *Remaking the North American Food System: Strategies for Sustainability*.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2007
- [17] 叶敬忠, 王雯. 巢状市场的兴起: 对无限市场和现代农业的抵抗. 贵州社会科学 2011(2)
- [18] 石嫣 温铁军 等. 生态型都市农业发展与城市中等收入群体兴起相关性分析——基于“小毛驴市民农园”社区支持农业(CSA)运作的参与式研究. 贵州社会科学 2011(2)
- [19] Morgan K. & Marsden T. & Murdoch J. *Worlds of Food: Place ,Power , and Provenance in the Food Chai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 [20] Thompson C. J. & Coskuner-Balli G. Countervailing Market Responses to Corporate Co-optation and the Ideological Recruitment of Consumption Communities. *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 ,2007 ,34(2)
- [21] Beckert Jens. What Is Sociological about Economic Sociology? Uncertainty and the Embeddedness of Economic Action. *Theory and Society* ,1996 ,25(6)
- [22] 王宁. 消费行为的制度嵌入性——消费社会学的一个研究纲领. 中山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8(4)
- [23] Brinton Mary & Nee Victor , eds. *The New Institutionalism in Sociology*.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 1998
- [24] 王宁. 代表性还是典型性? 个案的属性与个案研究方法的逻辑基础. 社会学研究 2002(5)
- [25] Wright W. & Middendorf G. *The Fight over Food: Producers , Consumers , and Activists Challenge the Global Food System*. Pennsylvania: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08
- [26] Hjalager A. M. & Richards G. , eds. , *Tourism and Gastronomy*.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2
- [27] 贝克. 世界风险社会. 何博闻,译.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 [28] Esteva Gustavo. Re-embedding Food in Agriculture. *Culture & Agriculture* ,1994 ,48
- [29] Pratt Jeffrey. Food Values: The Local and the Authentic. *Research in Economic Anthropology* ,2008 ,28
- [30] Thompson C. & Coskuner-Balli G. Enchanting Ethical Consumerism: The Case of Community Supported Agriculture. *Journal of Consumer Culture* 2007 ,7 (3)
- [31] Klein Jakob. Creating ethical food consumers? Promoting organic foods in urban Southwest China. *Social Anthropology* ,2009 ,17

Institutional Embeddedness and Local Food System: Based on a Case Study of Three Typical CSAs in Z City

Liu Fei

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worsening food safety conditions , some consumers exit partly from the mainstream food system and adopt an alternative food system. And in local food systems , community support agriculture is the most main forms. In this paper , we discuss how three typical community support agriculture models (that is consumers' driving , producers' driving and NGO driving) in Z city embed in specific institutional contexts and solve the problems of uncertainty successfully. We analysis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of the three models briefly as well.

Key words Institutional embeddedness; Local food system; Community support agriculture; Case study

(责任编辑: 连丽霞)